

主 编 / 郭建宁
副主编 / 程美东

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

本辑焦点

深切缅怀黄枬森先生·····

陈先达 梁 柱 等

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石仲泉

近80年来中国人眼中的《国家与革命》·····

何 萍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生的十大突破·····

李士坤

幻想世界中的真实世界·····

——马克思是如何从人间升到天国的？·····

侯惠勤

从全球化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丰子义

新中国陆地边界谈判的历史脉络及其基本经验·····

齐鹏飞

2013

总第三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

主编／郭建宁
副主编／程美东

总第三辑

20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 总第3辑/郭建宁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097-5552-5

I. ①北… II. ①郭…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20255号

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总第三辑)

主 编 / 郭建宁

副 主 编 / 程美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晓莉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袁卫华

责任校对 / 丁立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552-5

定 价 / 59.00元

印 张 / 18.75

字 数 / 318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13

(总第三辑)

目 录

CONTENTS



特 稿

深切缅怀黄榕森先生

陈先达 梁 柱 等 / 3

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石仲泉 / 41

建国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演化与丰富

——读《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胡为雄 / 71

毛泽东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历程及其影响

丁俊萍 / 106

经 典 解 读

近 30 年来中国人眼中的《国家与革命》

何 萍 / 125

理 论 探 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学的十大突破

李士坤 / 139

幻想世界中的真实世界

——马克思是如何从人间升到天国的？

侯惠勤 / 165

- 从全球化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丰子义 / 175
列宁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宋国兴 / 187

特色理论

-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称谓的提出及其内涵的发展 肖贵清 / 197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创新历程 韩振峰 / 210

思政研究

- 论意识形态工作的三个策略 刘建军 / 227

国史纵横

- 新中国陆地边界谈判的历史脉络及其基本经验 齐鹏飞 / 237

海外观察

- 马克思、浪漫主义和生态学 [英] 麦克莱伦 著 李 健 译 / 257
亲身感受若干美国人对于中国西藏问题认知上的偏狭态度
[美] 韩东屏 / 263

青年论坛

- 论马克思哲学范式的系统涌现及其自由内核 魏 波 / 275
《1857~1858年文本群》研究新路径
——以《危机笔记(1857~1858)》为契机 陈长安 / 288

特稿

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
(总第三辑)



深切缅怀黄枏森先生

编者按：2013年1月24日，德高望重的黄枏森先生遽归道山，永远离开了我们。黄枏森先生是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先生的离去，是北大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大损失，而先生留下的著述和治学精神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摘录了2013年清明节黄先生追思会上一些代表的发言和相关追思文章，以此寄托我们共同的哀思，深切缅怀先生的道德文章和精神风范。它们分别是：陈先达《清明时节怀故人》，梁柱《君且去，长相忆》，杨祖陶《四大贡献，彪炳史册》，韦建桦《学术品格，后世圭臬》，王东《哲学创新，传世遗愿》，袁吉富、李凯林《服膺科学，风范永存》，李少军《永远的丰碑》。

清明时节怀故人

陈先达

清明节，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亲情、人情味的节日。慎终追远，继往开来，凝集中国文化的伦理观、生死观。在这个节日里，想起刚离世不久的黄枏森先生，百感交集。

黄先生比我年长十岁，是我的老师辈。我很早就知道黄先生的大名，但无交往。从80年代初开始，我与黄先生每年在社科基金会上会碰面。后来黄先生不再参加评审会，我们也会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面。黄先生与我可以说不亦师亦友。后来，他渐入高龄，我也年老，参加学术会议的“积极性”越来越小，但每年春节都会互致问候。黄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史方面的学术造诣极高，是我们的领军者。他晚年仍旧保持旺盛的创造力。人学科学的开创性工作，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体系的鸿篇巨作，都表明了这

一点。

从黄先生八十到九十三次重要寿期，我曾写过三首诗祝贺。虽然见面少了，以诗传情，也不失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交往方式。

黄先生八十，我七十。我对他笑称，我们是七老八十。他过生日当天，我曾贺之以诗：

身如药树君真健，温和谦恭长者风。
字字珠玑叹妙笔，桃李满园道不穷。
未列门墙心私淑，每聆高论暗称同。
双手过顶三敬酒，我祝先生百岁红。

双手过顶，尊以师礼。一眨眼他八十五，我七十五，又以诗为贺：

欣逢八五庆生辰，犹记八十客盈门。
虽说五年弹指过，又见纸贵洛阳城。
大名岂独铅字铸，道德文章两相能。
百岁可期仍健笔，都道哲人似仙人。

末联“百岁可期仍健笔”，是羡慕他年过八十仍笔耕不辍；“都道哲人似仙人”是赞他为人谦和，即使发生争论，笔下没有霸气，仍然娓娓道来，心平气和，从不以势压人。黄先生有学者风、长者风、仁者风。

我八十岁时，黄先生曾寄诗为贱寿祝贺：“语言铿锵意蕴真，先生风采早惊人。而今耄耋锋尤健，入本三分析理真。”这是对我的鼓励和厚爱。在他面前我不敢妄称高龄，确实也是老人。转日，黄先生九十大寿。“秀才人情一张纸”，我也贺以诗：

五十年前是我师，五十年后情更深。
莫谓荷戟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

“莫谓荷戟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是有感而发的。我知道有些学者对黄先生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这并不奇怪，也很正常。学术讨论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但我对在同一刊物约集多人对德高望重的黄先生采取围攻式的批



判有不同看法。我也发过两篇文章，对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问题表示看法。“莫谓荷载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指的是在维护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方面，黄先生并不是孤立的。虽然我与黄先生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上，在如何论证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上，也有差异和各自不同的论证方法，但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莫谓荷载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指的就是这场“公案”。

我们哲学界有个流传很广，影响极深的看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物质性、强调世界的存在不依存于主体是在重复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哲学错误。其实，主客有分而不能不分。二分是应该承认的，主客绝对对立是应该反对的。承认主客二分、承认在实践基础上主客统一，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前提。如果我们的世界是主客不分的世界、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混合为一的世界，人类的实践和认识就无法进行。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和哲学大家，他倡导“天人境界”为最高道德境界。但冯先生同样承认，“世界本非为人而设，人偶生其中耳。人既生于此世界之中，一切欲皆须于其中求满足”。还说，“世界既是非为人设，故其间之事物，当然不能尽如人意”。如果把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圣人、贤人、真人、至人的人格追求，作为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则越界矣。

世界是客观世界，是不依存于自我的世界，这是人类实践史和科学史反复证明的真理。自然界并不会因为人化而变为非客观世界。人化世界仍然是客观世界。自然界是不会开玩笑的。它是客观的、有自己运动规律的物质世界。谁要是认为可以主客不分，可以把人的主体意志混同于客观自然，必然受到惩罚。自然对人的报复，说到底是在自然对自然人化越轨的报复，是客体性对主体性妄自超越的警示。现实自然界中种种生态恶化的情况表明，任何时候人化自然背后都有自在自然在起作用。任何不顾自然本身承载力和规律的人化，都必然遭到惩罚。以人本主义世界观、人本主义自然观、人本主义历史观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不可接受的。我虽然不一定完全赞同黄先生的每一个论点，但我赞同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根本立场。

“莫谓荷载独彷徨，同一战壕两老兵。”黄先生已经作古，可以安息，不用再“荷载”战斗。他留下的著作和治学精神永远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老一辈工作者日渐凋零。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大批中青年学者，在创新中会继承和发扬黄先生追求真理的荷载精神。

君且去，长相忆

梁 柱

当代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备受北大师生敬重的黄枬森教授，以九二高龄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就他个人来说，道德文章两垂范，哲人光泽照后人，可谓一生无愧无憾。但他的离世，对中国的理论界、哲学界，对北京大学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记得在他罹病这些年，看到他依然顽强地生活、写作，参加学术活动，依然态度安详、淡定，心中总是为他高兴、祝福。我曾对他说过，您一定能够很好地康复、长寿，您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您在，对我们就是一种鼓舞力量，就有意义。遗憾的是，自然规律不可违，疾病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我真切地感受到失去了一位可敬可亲、亦师亦友的长者，心中十分痛楚。

我与黄枬森教授初识于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下放到十三陵水库边的北新村，准备长期劳动并参加一些农村整社之类的工作。这个村子开始属于十三陵公社，后划归十三陵农场建制。记得这年的国庆或中秋节，农场领导为了给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多数是北京大学的教职工）改善一次生活，包了一顿猪肉白菜馅的饺子。于是，分散在各村的下放干部都集中到场部，其中有一些是北大哲学系的教职员。厨房里热气腾腾，我们就在外面静静地等候。这时有熟人为我介绍北大的同仁，其中就有黄枬森同志，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厚道朴实，沉默寡言，也许这同他此时并非处于顺境有关。我并不了解他们下放是长期还是短期，具体在哪一个村，大概在1962年初我们都先后回校了。后来偶然在校园里相遇，也只是点头示意或略作寒暄。及至改革开放新时期，他有了施展抱负的机遇，成就和影响也日益扩大，特别是他的《〈哲学笔记〉注释》《〈哲学笔记〉与辩证法》等著作问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之后我们在工作上、科研活动中有了较多的接触，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黄枬森教授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学者，始终把他视为北大理论学科一位兄长式的师长。他有理想，有信念，有思想，一身正气。他青年时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地下斗争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他也经历过人生的坎



坷，但在我们的接触中，无论是私下谈话，还是公开场合，他从不谈个人受到的不公平遭遇，从不以个人的某种不幸来发泄对历史的怨恨，作为判断历史功过是非的标准，而总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我们的事业和人生。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有些人甚至某些老共产党员，就是以个人曾经受到的一些委屈，无休无止地仇恨党的历史，诅咒和抹黑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甚至向西方另找出路。同这些人相比，更显得黄枏森教授的思想境界、道德风范，是那样的高尚、无私，深刻理解我们党的事业所经历的正确与错误、辉煌与挫折相交织的历程。在学术活动中，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关心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及面临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对这些，他都通过缜密的思考，有理有据地加以分析，很好地做到了以理服人。前些年当“普世价值”说兴起时，我曾和他讨论过，我谈到，在伦理道德，包括某些政治思想，人类是有某种共同的标准、要求，但现在一些人所主张的普世价值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这样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是强加给别的国家的。他听后明确表示，这是应该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对我们来说是应该加以抵制和批评的。他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枏森教授为文与为人一样，都是那样朴实无华，严谨求实。他的文著，凡是在报刊上见到的，我都一一拜读；他赠送给我的两部自选集，也都通读过。我们不是一个专业，自然无法从哲学专业的角度加以深刻理解，但读后都会感到获益良多，对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有启示作用。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不像时下有些人那样为研究而研究，为发表文章而写文章，而是用心来写作，只要他认准的方向，认准的道理，会贯穿他整个研究的过程；他是为坚持和传播真理来表达真理的，态度是那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文章写得有深度，有新意，做到了深入浅出，意蕴深远，给人以思考和回味的空间。在这些年学术界的功利主义、学风浮躁相当泛滥之时，特别要提到黄枏森教授为人称道的朴实的学风和文风，他确实做到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古人有云：“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这就是说，文章如同雨露般的润人心脾，似鬼神般的变化无穷。刻在金石上以传播功德，谱之管弦而与日俱新。也许，这就是黄枏森教授写作所追求的境界，也是他学术活动的一个写照。他有很强的读者观念，写书是要给人看的，是要对我们的社会 and 事业负责的。在这方面，黄枏森教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是的，黄枏森

教授为人平和，待人宽厚，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对不同的学术观点，他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又能心态平和，不愠不怒。前些年一位外地学者发表文章表达对黄枬森教授的不同学术观点，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此人用词尖刻，不讲道理。我内心颇为不平，曾请一位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为黄先生说点话。在一个会上，当我同黄枬森教授谈及此事时，他平静地说，人家有发表文章的权利，没有什么关系；同时，他又坚定地维护了自己正确的观点。当时我想，这是多么好的一位学者的心态。

黄枬森教授是一位对工作极端热诚、极端负责的人。像他这样有大成就的学者，无论参加多小范围的研讨会，他都会认真准备，在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他要发言的内容，使人听起来都会觉得有内容、有思想，既易懂又好记，而绝不是应景而发，更没有拿腔拿调显示权威的派头，着实令人肃然起敬。他还十分关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鉴于我国一个时期以来对人学研究的缺失，在理论界极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工作。人们都记得，在这之前我国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中出现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黄枬森教授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他不赞成那种社会主义异化论的观点，他把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和作为伦理观的人道主义作了科学的区分，认为前者是一种唯心史观，而后者则是可以加以批判地吸收和改造的。这个观点他一直坚持不变，也奠定了他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基点。后来，他和陈志尚教授一起筹建北大也是全国的人学研究会，他们几次和我谈了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项有开创意义的学科建设，对我国内政和外交工作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表示积极的赞成和支持。当时学校经费比较困难，还不可能支持虚体的研究机构，我只得向有关部门化缘了5万元，作为研究会成立经费。可以说，黄枬森教授是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人学学科的积极推动者和开拓者。

黄枬森教授为人谦逊，待人以诚，重亲情友情。1996年，他领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版问世后，打电话表示要送一套书给我，我表示感谢后说过两天到他家去取。未曾料到，第二天他就抱着八卷本的这套书给我送来，当时他已年近八旬，这件事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内疚。当时我住在三公寓，对门一家有位女士教孩子弹钢琴，常常看到黄枬森教授接送他的外孙女来这里学习，有次我碰到就问他，你工作这么忙还管接送孩子，不要太累了。他满脸洋溢着幸福说，这也是一种享受。这大概就是生活中的黄枬森教授。有一次我和他一起拉着这个小女孩下楼，我问她，你知道你爷爷是



干什么的吗？孩子天真而骄傲地说是北大教授；我告诉她，我这个爷爷也是北大教授，但是你那个爷爷的学生。孩子仰起头瞪大眼睛看着我，是信还是不信呢？今天回想起来，当年天真可爱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她一定会有乃祖之风，健康成才。

我在漫步时有一个习惯，如果遇见松树、松林都喜欢对它凝视遐思，它是那样的挺拔、沉稳，面对乱云飞渡、逼人寒气，都表现出从容不迫、傲视人世的神态，针叶青翠，一如既往。由此想到，松树的品格，何尝不是黄枏森教授为人为学的写照呢。他确是一位值得纪念、值得长忆、值得学习的大写的人。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唐人孟郊的诗句：“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来表达我对黄枏森教授的追思之情，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

四大贡献，彪炳史册

杨祖陶

黄枏森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哲学教育家。先生虽然走了，但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执着与坚守的崇高精神，他做出的一大批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均是学界的珍贵遗产，将永远为后学传颂、学习和研究。

黄枏森先生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由于对哲学的兴趣转而学习哲学，成为我国康德哲学先驱研究者郑昕先生的研究生。黄枏森先生的自然科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使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有宽广的视野，深厚的功底和深邃的眼光。他学贯中西，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均深有造诣，熟悉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学风上朴实无华，宽容严谨，守正与创新统一，理论与实际结合，善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不在乎人们说我‘左’还是‘右’，我只坚持我追求的真理”。

黄枏森先生的哲学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真正大展宏图，施展才华，开花结果，著书立说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他曾对人说：“我的学术生涯、学术生命，是从改革开放真正开始的。”从这时起，他密切注视着我国的社会现实和哲学事业的发展进程，笔耕不辍，撰写和发表了

大量哲学论著，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现实的一些领域，对所有这些领域都分别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论创新和重大贡献。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因此很难对他的学术成就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估。但我的学术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深深体会到在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的深刻意义与作用。在这里单就我个人的浅见来看，他至少在以下四个领域内，孜孜不倦，建立起来了四座雄伟的学术丰碑。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创新及其新形态问题。

黄枏森先生坚信、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必须把它作为科学来研究、建设和发展。他在 2005 年出版的《哲学的科学化之路》的后记中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写了不少文章，千言万语，可以归结为这句话：把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作为一门科学，它必须有自己研究的对象、关于对象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由它们组成的有逻辑联系的体系。黄枏森先生认为，20 世纪 20～30 年代苏联哲学界所构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科学体系。但这个体系不够完整严密，从而大大地影响了它的科学性。他主张在坚持这个体系的基本性质的基础上，根据当代科学与实践的水平，创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这必须从明确和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性质入手来解决这个任务。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对象是三个层次或三个重叠的世界：把世界作为整体来研究，它的一部分是唯物主义（世界的物质图景），一部分是辩证法（世界的一般辩证规律），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类历史当然应当包含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之内，但由于它对人类的至关重要性，可以抽取出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社会论，它的组成部分为：实践论（他认为实践不只是认识的基础，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结构论和人类社会规律论（人类社会辩证法）。而由于意识（或精神）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又可将它从历史观中分离出来与之并列，这就是意识论（或精神论）。它的组成部分是认识论（他认为认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应像过去那样放在世界观部分内，而应放在从历史观，即社会论中分离出来的意识论部分内）、价值论和方法论。黄枏森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学科群，它所包含的学科数目可以而且必须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学科的创立有所增加和变化。在 2006 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构想》一文中，他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



学新体系的构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个层次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历史观，另一个是人学。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由人来构成的，所以需要专门研究人的人学，由人再进到研究人类实践活动的“实践论”。

黄枏森先生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可以称为板块结构的体系。他曾尝试按照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要求建构了一个包含 36 对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融为一体，可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也可以称为唯物辩证法体系或一般辩证法体系。但他无意用它来替代现有的板块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依然实事求是地认为，如何按照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理，从抽象出发、依据对立统一规律，将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诸组成部分的全部内容建构成一个与现代科学和实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矛盾运动过程，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和发展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

但是，如何创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是始终萦绕在他心中的一个问题。他深知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哪一个人，而是要志同道合的人们共同来解决。他于是邀请陶德麟、赵凤岐、陈先达、陈志尚和蔡德麟等教授一起商讨决定，2001 年在深圳召开了一次有全国 17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研讨会，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的理念及其创立和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由黄枏森先生牵头的几位学者曾编写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初稿，并曾油印成册交流作为大学教材使用。在这一过程中他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的理念开始形成起来。改革开放后，他就从正面阐发了他的这个理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和其他科学一样有它萌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就必定有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相互交织与转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绝不是像过去以为的那样，是少数几个领袖人物的哲学著作所构成的真理加真理、没有什么是非功过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这样一个曲折、复杂、上升的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建立起来，其必然的后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基于这样的认识，黄枏森先生和其他学者共同努力，于 1981 年推出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他被公认为起了第一位作用的主

要撰稿人和统稿人。1987年他作为第一主编与北京大学学者共同推出了三卷本、计12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他不辞辛苦继续前行，1983～1996年，他作为第一主编，与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50多位学者共同努力，历时13载，推出了浩瀚的八卷本、计40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巨著，从而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世界前沿，大大超越和突破了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的研究水平。1998年，他还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一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教材，并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教材。

黄枏森先生在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过程中，显示出他非凡的理论驾驭能力，资料的运用能力，组织领导和相互协作的巨大凝聚力，从而完成了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学术伟绩。

第三，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奠基和创立。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惨无人道罪行的不很明确的控诉和清算。在这次讨论中有关“人”的理论问题受到文艺界、哲学界等的关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见“物”不见“人”的议论。黄枏森先生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方面拒斥了马克思主义不讲人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注意到文艺界、学术界所关注的人的理论问题中所指的人是“个人”。他实事求是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空白”虽然不是笼统的“人”的问题，但的确确是作为“个人”的“人”的问题。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要补充的正是关于“个人”问题的研究，即人学。他在1983年3月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学术讲演《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中阐发了他的上述那些思想。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对西方和苏联研究人学的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发现西方的萨特、加罗蒂、弗罗姆等已提出了建设一种科学的人学的任务，但没有真正走上科学建设的道路。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已出现了一批人学论著，80年代提出了对人进行综合研究的任务和“统一的人学是否可能”的问题，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建议。由于苏联解体，这些建议都搁置起来了，但其把人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的思路却是应当肯定的。在这样的基础上，黄枏森先生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和建设一门新的“人学”科学，以便对人作综合性和整体性的跨学科研究。

为此，经过三年的持续努力，以黄枏森先生为第一主编的、包括近